

体育活动，不仅是帝王将相和普通百姓休闲娱乐的方式，更成为封建统治者练兵的方式。在陕西体育博物馆“陕西古代体育的发展”单元，展出了汉代狩猎纹陶壶、六博棋盘和棋子、草叶博局纹带铭铜镜、狩猎纹画像砖、秧歌画像砖、唐代打马球俑等。在贾亚娟看来，多姿多彩的古代体育，是陕西体育博物馆的亮点之一。

据介绍，古代陕西体育发端于史前时期，兴起于周、秦，鼎盛在汉、唐。汉、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，也是中国古代体育大发展的时期。陕西是汉、唐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古长安是汉、唐时期都城所在地。汉、唐时期，陕西境内体育活动甚为活跃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：一是球类活动丰富多彩，尤以汉代的蹴鞠和唐代的马球最具特色；二是体育活动普及，元宵节观灯、清明节荡秋千、端午节赛龙舟、重阳节登高等节令体育活跃；三是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相当普及；四是中外体育交往频繁。

从陈列的展品所见，古代陕西体育不仅源远流长，而且丰富多彩。在陕西发现和出土的青铜器、秦砖、汉画像、摩崖石刻等文物中，有描绘狩猎、角力（摔跤）、马术、射箭等古时体育活动的图案和文字。至唐时，狩猎、马球、蹴鞠等纹饰图案，已成为铜镜上常见的题材。其中，马球是一项骑在马上挥杖击球的运动，唐代亦称击鞠。史传在唐代，上自皇帝，下至文武百官、平民百姓，都爱好马球，甚至女子打马球在当时已成时尚。每逢新科宣榜，在大雁塔以东的月灯阁都要举办马球赛会，被称为“月灯阁赛会”。据说，进士及第者于雁塔题名后，常聚集于此击球、宴饮。期间，广场杂演百戏，百姓及士宦之家于四周搭建帐篷，竞相观赏，“月灯阁赛会”因此成为中晚唐时期极有影响的文体盛会。

史料记载，唐时马球场千步长，百步宽，两端各有一球门，球门高丈余。比赛时，场上人数因队而异，可多可少，并无定数。球为红色，大小如拳。球杖顶端呈月牙形。规定每进一球得一筹，满十二筹为一局。人们在看到古代打马球的绘画或雕塑作品时往往不解，为什么选手坐骑的马尾要扎起来？贾亚娟解释说，因为马球运动竞争激烈，容易伤人，故常常将马尾扎起来，尽量减少运动场上的意外伤害。到了明代，马球由双球门的激烈对抗改为单球门的技巧表演。清代中叶以后，马球运动在我国就基本停止活动了。

谈到马球，不能不提到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幅画《便桥会盟图》。据介绍，《便桥会盟图》为元代画家陈及之创作的纸本白描画卷，该画卷纵36厘米，横774厘米，全图共绘制246人、180匹马和4头骆驼，堪称是元代绘画中人马最多、物景最宏大的历史题材画作。画面展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，有狂奔的马队、惊险的马上杂技、激烈的马球表演，以及驼马、整队士兵、零散骑士等，卷末绘有李世民端坐龙辇，在便桥桥头与突厥首领颉利罢兵议和



唐代马球运动硅胶像场景复原

的情景。便桥位于今西安、咸阳之间的渭河上，故“便桥会盟”也被称之为“渭水之盟”。《便桥会盟图》原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，陕西体育博物馆内展出了该画卷中马球表演部分的影印件。

蹴鞠被视为古代的足球运动，至迟在战国时期已开始流行。据历史记载，汉、唐是蹴鞠运动发展的重要时期。古时，蹴鞠有三种基本玩法，其一是汉代的双球门对抗赛，其二是唐代的单球门射门赛，其三是没有球门的单人、双人或多人的花样踢球表演。大量的图文史料及考古表明，长安城与中国蹴鞠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一楼展厅还展出了东汉文学家李尤的《鞠城铭》。据说这是李尤为一鞠场奠基石写的铭文，原文为：圆鞠方墙，仿象阴阳。法月衡对，二六相当。建长立平，其例有常。不以亲疏，不以阿私。端心平意，莫怨其非。鞠政犹然，况乎执机。其大意是：鞠是圆的，像天，属阳。球场是方的，方墙像，属阴。寓意天圆地方的阴阳之说。两边球门，如月相对。每边六个球门，共十二个，象征一年十二个月。场上有正副裁判，遵照常例的比赛规则，公正执法，不徇私情。运动员服从裁判，若被判罚，不要有怨言。球场比赛裁判须公正，朝廷执法也应该这样。据悉，《鞠城铭》是中国、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关于足球文化的文献，也是研究中国古代足球竞技方式最原始的资料。

据陕西省甘泉县博物馆收藏的宋代画像砖“捶丸”拓片分析，捶丸由步打球发展而来，风行于宋、元、明三代，类似今天的高尔夫球运动，也与曲棍球有些相似。据考证，捶丸所用的球以硬木制成，球杖为木、竹合制。比赛时场地上设有球洞，以击球入洞多者为胜。捶丸至清代就已衰落了。

实际上，至宋代，陕西古代体育因为失去了都城所在地的优势，不如汉、唐鼎盛时期那样活跃，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逐步向多样化、规范化发展。到了清代，陕西古代体